■隐蔽战线

中共早期的情侦保卫工作

□徐 焰

任何进行残酷斗争的政治集团或军队，能侦察对手并保卫自己才有获胜的前提，即如同《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便在白色恐怖下面临着追杀围捕，若不建立情报侦察和内部除奸保卫工作，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从大革命时期至土地革命初期开始，周恩来等人便领导组建了对敌侦察和党内保卫机构，同时从一开始便规定严禁恐怖活动及不得在党内相互侦察，使中国共产党的情侦保卫工作从一开始便在正确原则指导下发展，并同苏联那种错误的情报工作原则划清了界限。

对敌设眼线并建立“红队” 健全外侦内防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保卫工作，首先体现为敌对营垒中建立情报关系。从1921年建党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党的组织只建在知识界和部分工人区，党员只发展到几百人，没有武装也没有保卫机构。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省内终于有了合法存在和发展组织的条件，建立了少量军队和工农武装，不过也引来了国民党右派的妒恨。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要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提供情报的内线。

进入1926年以后，随着党的力量大发展和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又派遣陈赓和在上海工运中打出些名气的顾顺章前往苏联，学习情报和保卫工作的经验，准备建立自己相应的组织。同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俗称“打狗队”的“红队”，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陈独秀、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并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不过此时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侦察工作还很不健全，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事先有内线报告国民党要密谋采取“清共”行动，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中共中央负责人面对零零星星获得的一些警告，又缺乏分析能力和紧急应变的决心，结果在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性的搜捕袭击而损失惨重。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前一段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及时了解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属下各派军阀的动向，并为中央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反共会议后，中共中央便马上掌握了这一情报，主要负责人都能迅速隐蔽疏散。

当时的形势逆转，又造成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悬赏5万至8万银元，一些追求享乐和腐化的动摇分子便向敌告密甚至充当内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有些想叛变的人找到地下党组织进行敲诈，声言若不给钱便去告密。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的赵世炎得知后马上通知绝不能给钱，应立即斩断与他们的关系，如果实在避不开便派“打狗队”消灭这些叛徒。随后赵世炎本人就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这一惨痛教训说明在当时党内建立除奸保卫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1927年8月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重组了中央特科，翌年春周恩来又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即“契卡”的后继）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领导，实际由周恩来主持，分为一科科长洪扬生主管总务、二科科长陈赓主管情报、三科科长顾顺章主管“红队” 四科科长李强主管通讯。各科人员都很精干，如三科即“红队”起初只有十几人，靠4支手枪严惩叛徒就威震上海滩。

惩处内奸却不许搞党内 侦察和恐怖活动

中共中央特科刚展开工作时，党内便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央特科内线很快查明，这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所致。这对夫妇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自然无法满足奢华需求。贺芝华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何家兴夫妇对敌做叛卖交易，对中共中央形成巨大威胁。各负责人在紧急搬家的同时，“红队”人员便以办喜事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关系查明，告密者是此时在军委担任秘书的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又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下达的“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的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红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中央特科组建后，其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工人如顾顺章等，这些人热衷于打打杀杀，甚至以解决党的经费为名提议采取绑票等行动。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当时党内的分歧很激烈，甚至出现过组织分裂，周恩来坚持要求对党内有政见分歧者不能采取侦察，脱党分子只要不为敌所用也不应采取武力制裁。如陈独秀、罗章龙都先后错误地拉起一些人另立“第二中央” 中央对其只是开除党籍而无其他激烈措施。

中国共产党建立情侦保卫机制之初，曾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却从一开始便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为领袖个人对党内监视的工具，以致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周恩来最早提出禁止党内搞侦察的原则，几十年间又一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这对防止中共重蹈苏共的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许多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如蒋介石等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

在敌要害部门设立内线 危急时刻挽救党中央

中共中央特科建立后就担负对内对外两方面任务，打击内部叛徒虽非常重要却只能起威慑作用，打入敌营掌握情报才能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同时也有利于帮助指导革命战争。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 “拿过来”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派人进入敌特组织，一方面尽量将其拉出来为自己服务。

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建立情报机构，还晚于中共的特科，而且招募方式主要靠重用同乡和私人，这造成其漏洞百出。中共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利用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来的中统）头子徐恩曾建立私人关系，打入其内部担任重要职务，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曾乘机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被破译。

中共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中共特科便将他发展为反谍报关系。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凡经杨登瀛之手的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生）因丧失革命理想，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并准备出卖中央领导人。此消息经杨登瀛报来并查实后，“红队”便佯称国民党来人找黄第洪谈话，用黄包车将他拉到一个僻静处消灭。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面见蒋介石，保证在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才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的千钧一发之际迅速转移。不过，被周恩来誉为打入敌特内部“前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因自身暴露不得不撤出。杨登瀛因顾顺章出卖被捕，这使中共中央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掌握国民党的核心机密。

顾顺章叛变后，特科大量情况被敌掌握。1931年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虽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临时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当时党的白区工作遭到全面挫败，虽然有着采取过“左”的斗争形式等多种因素，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关系丧失也是重要原因。

1931年以后的几年间，坚持“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进入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后，在保卫工作上又出现了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当时在红军和苏区内曾模仿“格别乌”建立起凌驾于各级党组织之上的垂直领导的保卫部门，将党内一些不同意见视为敌对行为而盲目进行“肃反”，造成冤杀许多同志的大悲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总结以往党内保卫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党内政治斗争中不能杀人，“人头不能像割韭菜”，留下活人处理错了还可以平反。后来党内虽然也出现过许多次过火的政治斗争，包括“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情报部门仍基本未涉及这些斗争之中，党内斗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也一直沿用，这又能保证大部分被错整错斗的干部能等到平反的一天。回顾这些历史，人们也更会感到周恩来在党的情侦保卫工作建立初所提出原则是非常正确的。

■军队建设

美加军港建设的成功之处

□时 贵

我曾随海军113、881舰艇编队出访过美国、加拿大、菲律宾三国，美国和加拿大海军在军港建设上的许多成功做法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科学的港口防污方法

当舰艇编队驶进美国圣迭戈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艘艘现代化的战舰，仅航空母舰就停泊了4艘，驱逐舰、辅助船各型舰船数百艘。衬托战舰的是军港秀美和洁净的环境，蓝色天空下海鸥飞翔，清澈海水中海狮戏水，波光粼粼的海面见不到一点点浮油和垃圾，在容纳如此多战舰的军港里，有着如此美丽的港区环境，令我们对美国海军重视生态保护、加强环境治理水平钦佩不已。

我们在参观和考察中了解到，美军在港口防污上主要有以下一些好的做法。第一，经常对海军官兵进行自觉维护港区环境的教育。第二，制定严格的港区防污规定和监督检察机制。在港内我们经常看到，港口防污管理人员，乘坐专用小艇检察和巡视港区，对在港内水域排污和倾倒垃圾的军舰或个人将处以重罚。第三，通过设立防污围栏，建立停泊舰船的防污责任制。在我们访问珍珠港和圣迭戈港时，就亲眼目睹所有停泊舰艇四周都是用橡胶防污围栏呈闭环式围住的，这不仅能随时防止舰艇污染扩散，还能分清造成污染的责任，有利及时查明随便“排污”或其它原因造成泄漏的行为。在我们靠泊码头的第一时间，就看到美军军港防污管理人员用小艇将防污围栏，分别布置在我军舰周围，以防我舰艇在停泊期间燃油、污水、垃圾等污染物对军港可能造成的污染。第四，建设良好的码头排污处理保障设施。美国和加拿大海军军舰在靠泊码头期间的污油、污水可以通过排污装置送给码头污油、污水处理中心进行处理，各种垃圾分类放入码头垃圾箱，由垃圾清运车定时清理。

务实的港口保障理念

踏上美国珍珠港码头，在港区内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草坪和枝叶繁茂的树木，配套和完善的港区技术、生活保障设施，充分发挥着“母港” “基地”的功能作用。

在技术保障方面，美、加两国的军港，各种保障设施完备，能为本港和过往舰艇提供良好的服务。主要表现在：一是港区内导航设施完善、先进，可保证航空母舰等大型舰艇的航行安全。二是服务周到的拖轮为各型舰艇离靠码头提供便利。无论美国还是加拿大，在我们访问的港口内都设有数艘拖船，专门为需要离靠码头的舰艇服务，这些拖船马力大、速度快、机动灵活，不论是拖带水面舰艇还是潜艇，其船员的操作技能非常娴熟。三是码头装卸设备完备，机械化作业，工作效率高。在美、加两国访问时，我们发现宽阔的码头上放置着各式舷梯，配备着可供选择使用的各型吊车和铲车设备。加拿大海军码头上装备的固定长臂塔吊，其长度可覆盖整个码头，便于在码头装卸各类货物。四是码头供电、供水、供油和供气设备齐全。我们在访问时了解到美军军舰靠码头后，码头能按各型舰艇的要求，保障全舰各系统不同的用电需求，舰上空调机可全时使用，以保证各种电气设备良好的绝缘。在码头附近，还有消防队、舰船修理厂等技术保障设施，舰船回港后可立即得到各种燃料补充、排污、加水和修理等保障。

在生活保障方面，岸港服务设施成龙配套。在码头及其附近有公用电话、自动售货机、自动取款机、邮局、洗衣房、理发店、餐饮店、免税商店、私人汽车停车场、军官公寓和士兵公寓等各种生活保障设施，舰艇靠码头后，舰员可得到充分休整。

完善的港口警卫体系

加强港区的安全警戒，保障停泊舰艇的安全，是军港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军港的重要保证。我们在出访中了解到，美、加海军对停泊码头舰艇的安全保障，基本做到“警卫正规，措施严密，务实有效”。

第一，军港与民港相互独立，保证军港管理的集中和统一。在我们访问的四个港口中，军港和民港都是分开管理，相互独立，在军港内既看不到“横冲直撞”的商船，又没有“自由散漫”的渔船，为军港内部舰艇的管理和安全警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明确停泊舰船的安全保障责任，区分军港内部安全警卫范围。一是加强码头区域的安全检查。美军在码头设立舰艇停泊区，并用钢丝网隔离墙将舰艇停泊区与港区隔离，舰艇停泊区的出入口分两个入口 一个入口提供给长期停泊在此码头的水兵使用，为一种无人看守的单向自动门，人员由钢丝隔离墙外进入码头时，可用本人的“ID Card”在刷卡机上刷卡，自动门将自动打开，而当人员从里面走出门外时，可以随便外出，这样既保证了水兵外出的便利，又保证了码头的安全。另一个门是人工警卫门，由海军警察担负值勤任务，对进入停泊区的人员证件进行检查。海军警察队员无论男女，个个军容严整，精神抖擞，身上配备手枪（或步枪） 子弹、手铐、可伸缩钢鞭、警棍和步话机，每个值班队员克尽职守，认真细致，对进入码头区的人员，无论军衔高低，亲疏生熟，一视同仁都必须验明身份。有一次，我和我的战友进入时，故意将证件晃了一下往前走，最终还是被值勤人员叫回核实证件。二是加强停泊舰船的安检。在每艘停泊舰艇的舷梯入口，设有舰艇值勤员，都是由本舰士兵担任，值勤人员一般身着作训服，配备自动步枪和子弹，负责对登舰人员进行检查和登记。经过我仔细观察发现，值勤人员不仅对外来人员进行检查，而且对本舰外出归队的人员，也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登记。

第三，加强停泊舰船周边机动巡逻，建立“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港区警卫体系。在港区内我们时常遇见巡逻的海军警察，通常两三个人一组，身着作训服，配带手铐、对讲机，荷枪实弹，他们或步行或驾驶警车，主要负责维护军队的纪律和港区的治安、秩序，有时还出现在通向码头方向的公交汽车上，检查每个乘客的身份证件；为了加强停泊港区内舰艇的安全保障，美、加海军警察每天定时派出冲锋舟、直升机，加强对舰船周边海、空域的巡逻。



加拿大海军警察在码头停泊区出入口值勤

■当代世界军事

“军事—媒体—工业”复合体：美国对台军售的幕后推手

□石海明 曾华锋

2010年8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宣布，国务院已通知国会准予向军工企业颁发许可证，凭借这些许可证，私人公司将得以向台湾出售有关雷达的防务设备、技术数据及其他防务用品，以加强台湾军队现有的防务雷达系统。就这一军售协议的去向，“美台商业协会”近日表示，相关武器装备还将用于“经国号”战机的雷达更新，总额预计超过5000万美元。

我国外交部已多次就对台军售问题正告美国，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原则，损害了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台海局势和平稳定，强烈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立即停止有关对台军售的一切行为及言论。然而，美国有关方面对此警告却置若罔闻，就在今年的1月份，奥巴马总统即又批准了对台湾出售64亿美元的一份军售协议，时至7月，美国国防部更是宣布，将出售台湾总价值达6599万美元的32具鱼叉导弹弹体，4具B级鱼叉导弹发射器以及相关的备用零件与后勤支持。该计划已经外包给了军工企业波音公司，预计2011年6月即可完成定单。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劳利说，“对台军售只需美国与台湾的沟通对话，美国在决定军售事项时，不会与其它任何国家商讨此事”。

面对美国如此霸道的做法及相关言论，我们在进行谴责的同时，更需要聚焦其幕后推手——“军事—媒体—工业”复合体，看看其到底在这一并不正大光明的交易背后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961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首次提到了“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概念，当时，艾森豪威尔旨在告诫美国人要警惕“军工复合体”绑架美国政府。对此，多年来美国人可谓牢记在心，不时有人重温艾森豪威尔的警告。但与此同时，却在其中也悟到了一个操控世界的“法宝”，这就是今天的“军事—媒体—工业”复合体（military-media-industrial complex），它不谋求绑架政府，却意在绑架世界，帮助美国推行全球主导战略。

具体而言，美国军方与企业界千丝万缕的瓜葛人们一般比较熟悉，如小布什政府的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夫威茨就曾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如今奥巴马政府的副国防部长威廉·林恩也曾任雷神公司的副总裁。前总统布什家族更是典型，其曾祖父萨姆·布什早年在俄亥俄州经营一家生产武器的钢铁公司。并于1917年被任命为联邦战时工业委员会轻武器和弹药分会的主任。布什总统的另一个曾祖乔治·沃克曾是圣路易斯的金融商，参与了20世纪初美国的诸多军事合同。在现今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形成过程中都有上述两人的身影。布什总统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在二战前曾与德国拥有广泛联系，也与军工企业有直接瓜葛。其儿子乔治 H W·布什则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及总统，参与过和伊朗、伊拉克及阿富汗“自由战士”间的军火交易。

再如美国著名的投资公司卡莱尔集团，其顾问及董事会成员中就有弗兰克·卡卢奇与科林·鲍威尔两任前国防部长，公司大部分利润也都来自政府的军事承包合同。与军方和企业的关系相类似，美国强势媒体与军方的关联也颇有渊源，如被誉为美国新闻工作者之父的李普曼，同时也是一战时传单的制造者。另据美国学者大卫 罗伯在其著作《操控好莱坞：五角大楼与好莱坞的瓜葛》中的研究，国防部与好莱坞很久以来也保持有密切合作。此外，其他强势媒体，如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后台老板是通用电器公司（GE），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则受西屋电器公司的控制，而通用和西屋都是大军火供应商，与五角大楼关系非同寻常。

正是在上述美国“军事—媒体—工业”复合体推动下，对内给国家军备找借口，为军工企业谋利益，对外旨在实现全球战略部署，美国国防部、军工企业与强势媒体往往联袂出击，不断渲染军事威胁、挑起地区争端，诱导军备竞赛，并借机通过向对立双方进行军售，不断演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如在2010年8月17日凌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长达83页新版“中国军力报告”中，就又对台海局势大肆渲染，为对台军售先期制造舆论。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一方面要据理力争，充分谴责；另一方面，我国也要加快提高媒体实力，以便在认知空间争夺话语权，让美国“军事—媒体—工业”复合体这一对台军售的幕后推手曝光于全球正义的阳光之下。